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2 冊

王荊公金陵詩研究

劉正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荊公金陵詩研究／劉正忠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目 4+26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第 12 冊）

ISBN-13：978-986-7128-92-8（全套：精裝）

ISBN-13：978-986-7128-83-6（精裝）

1.（宋）王安石－作品評論

851.4515

96003198

ISBN - 9867128836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一輯 第十二冊

ISBN：978-986-7128-83-6

王荊公金陵詩研究

作 者 劉正忠

主 編 龔鵬程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 年 3 月

定 價 第一輯 20 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金陵詩的意義與範圍	1
第二節 荊公詩文集及其箋注	5
第三節 論題旨趣與研究方法	9
第二章 專擅一壑：退閒生活與暮年心境	15
第一節 時代感受與政治體驗	15
一、荊公與時代風潮	15
二、熙寧變法與黨爭	19
三、二度罷相之始末	23
第二節 生活環境與日常行止	26
一、出世與入世的抉擇	26
二、園宅·山水·風物	32
三、家庭生活與交游	35
第三節 暮年心境與生命追求	40
一、新法前景之挂懷	40
二、老病與死亡陰影	46
三、《字說》：最後的志業	53
第四節 佛學信仰與晚年思想	58
一、佛緣與佛事	58
二、儒釋老融合論	64

三、晚年的佛學研究·····	69
第三章 法度之言：荊公詩學的基本架構·····	75
第一節 經學化的詩學體系·····	75
一、新法、新經、新詩學·····	75
二、論詩不失解經旨趣·····	80
三、疑經改經與讀詩方法·····	86
第二節 重法度的詩學傾向·····	89
一、詩的釋義與定調·····	89
二、先體製而後工拙·····	96
三、法的限制與突破·····	101
第三節 詩學法式的建立·····	107
一、典範追求與《四家詩選》·····	107
二、杜詩的重新「發明」·····	113
三、合老杜西崑於一手·····	117
四、《百家詩選》與晚唐異味·····	122
第四章 道中有味：金陵詩的意蘊與美感·····	129
第一節 詩禪交涉·····	129
一、智識化的禪學·····	129
二、以聲音為佛事·····	132
三、對智識的反省·····	135
四、悟文字之性空·····	139
五、借機鋒於偈頌·····	143
六、化禪悟為詩情·····	148
第二節 義理追尋·····	150
一、以詩為議論·····	150
二、詠史與懷古·····	154
三、託物以言志·····	158
四、哲思的美味·····	161
第三節 美感特質·····	164
一、聲色之淡化·····	164
二、動靜互涵·····	169
三、漫遊與漫成·····	174

第五章 王荊公體：金陵詩的藝術風貌	179
第一節 體裁表現	179
一、備眾體，精絕句	179
二、暮年小語的獨詣	184
1、以思理生風味	184
2、以功力造清新	187
3、工整間見翻騰	189
4、以聲響提神氣	191
三、集句詩的創作意義	193
第二節 形式技巧	198
一、一字兩字工夫	198
二、晚年句法進境	202
1、得古詩句法	202
2、得老杜句法	205
3、荊公句法	207
三、字字有根蒂	209
第三節 風格特徵	214
一、求渾成於工整	214
二、融奇崛於尋常	219
三、寓悲壯於閒淡	223
四、出妖冶於老成	227
第四節 詩史定位	231
一、變古：「宋調岔出」	231
二、自立：「臨川宗」	234
三、開來：「江西別宗」	239
第六章 結 論	243
引用書目	24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金陵詩的意義與範圍

近人汪辟疆曾經慨歎：「臨川以新政爲世詬厲，攻之甚力，向不推其詩。即偶及之，亦謂其『有工緻無悲壯，學之使人才據而筆退』，或又謂其『直勁無徊漩者』，皆僅從一二篇而肆意詆誣耳。余謂坡、谷大敵不在歐、梅，而在荊公。晚年在金陵諸作，即坡公亦深致歎服。文章有真賞者，決不爲世論所惑也。」〔註1〕要從宋代詩人之中，求一足與蘇、黃鼎足而立者，不僅歐、梅難當其選，即後山、誠齋、放翁三子，亦不無遜色。惟有荊公，無論就作品質量、學識懷抱、性情胸襟而言，都足以並列而無愧。融合學術與政治的文學型態更是規模宏闊，爲同時諸子所不及，足以在詩壇別樹一幟。因此，宋人論詩每以王、蘇、黃三家並稱，〔註2〕而元人袁桷更有臨川、眉山、江西三宗之說。〔註3〕然荊公以變法得罪流俗，形象爲之扭曲失真，殃及詩

〔註1〕本書援引荊公詩，一律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朝鮮古活字本《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數/頁碼），以利翻檢。見《方湖日記幸存錄》「荊公詩摘句」一條，下署「宣統元年己酉二月十六日」。收入《汪辟疆文集》，頁838。

〔註2〕例證詳徐復觀〈宋詩特徵試論〉，《中國文學論集續編》，頁31～32。

〔註3〕見〈書湯西樓詩後〉，《清容先生文集》卷四十八。

文，造成「諱學金陵」的現象。^{〔註4〕}以致學者對荊公詩藝的體認與研索，其深度都遠不及蘇、黃，造成偏枯失衡的現象。時移勢易，近代學者已能持平評判其德業，正視其文學。但是，若衡以荊公詩歌方面之廣，品質之精，則當前研究實猶草草未入精微，不副他大家上品之實。然則不以分題細索的方式，實難抉盡其妙。因此，本文採用分期研究法，擇取荊公創作生涯最後的精粹部份，析其毫釐，祈能開發一代大家的豐盈內蘊。

荊公現存詩歌計一千六百餘首，創作時間綿亙近五十年，風貌幾經轉變。其間軌轍，以葉夢得《石林詩話》所論最詳：

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胸中事。後為群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其幼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歷代詩話》，頁419）

以此為據，則荊公的創作歷程約可概分為三期：起先則少年才力初發，血氣之旺凌駕藝術涵養，一任原始生命疾驅直駛。其次則轉任京官以後，人生經驗與藝術體會都漸趨厚實，乃博觀前賢佳作，追索判斷，居安資深，終於能夠正視詩藝本身的價值。其題則詠史論政，其法則翻案奪胎，其語則日鍛月鍊，其意則剗刻精深。誠可謂極盡翻騰變化之能事，為此後宋詩發展開闢無限法門。後來以變法集矢，退居金陵。風雲已盡，情志難竭，既遂少年歸隱之思，未克平生澄清之志。心神之糾結繁複，可以想見。雖受佛學影響，詩文一歸簡淡，但其間

〔註4〕元遺山〈論詩絕句〉其二十八：「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荊公去世，張芸叟挽詞已有「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之語。士子隨風轉舵的情形，可參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四（點校本，頁328），引《澠水燕談錄》。

悲情壯懷，自不可掩。此期所作，剝膚存液，褪去擾擾技藝，裸現生命本真。十年之間，佳作紛陳，臻及個人詩藝的巔頂，是爲本題研究的主要範疇。

趙與時《賓退錄》亦曾論及荊公詩藝的發展：「王荊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明確標出「知制誥」與「歸蔣山」兩個重要分界點，可以補充葉石林的說法。荊公晚年詩藝大進，此爲宋人公論。但若僅以罷相爲界，分爲前後兩期，則未免太過簡略，而忽略了葉趙兩氏皆論及的中間追索突破一段。案荊公出任「群牧判官」在至和元年（1054）九月，三十四歲，是爲首次出任京官。除「知制誥」則在嘉祐六年（1061）六月，四十一歲。參酌兩氏的意見，可以把這七年視爲初期到中期的過渡階段，基本上仍在摸索試探。此後至熙寧九年（1076）十月二度罷相以前，計十六年，可以視爲中期，風格表現臻於成熟的階段，也就是趙氏所說的「盡善」。但在他真正退閒以後，詩藝又有新的突破，遂進入最高境界，此即趙氏所稱的「造精絕」。

神宗熙寧七年，荊公初次罷相，六月抵金陵，隔年二月即被召復相，這段時間似乎尙無完全退出政局的準備。九年十月再罷相，雖領官銜，實已徹底脫離從政生涯，無論是生活、心境，都與初次罷相大不相同。因此，本文即以此爲上限，直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過世爲止，時間將近十年。不過，兩次罷相前後相距兩年多，作品風格已與暮年十分相近，可以視爲中晚期間的過渡階段，不必斷然排出論題之外。至於初、中期作品，則爲論題開展的基礎，自亦須時時照應，取相證發。進一步來說，本論文既以暮年作品爲主要範疇，實有揭示整體創作發展歷程的任務。蓋能確切把握最後一階段的作品風貌，即能收到「舉果知因」的成效。〔註5〕

〔註5〕惠洪《冷齋夜話》卷五，論及荊公「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一聯，嘗謂：「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此處翻用其說。

荊公暮年詩歌妙傳天下，時人曾選錄其「晚歸金陵後所作詩」別行。^{〔註6〕}除了上述引文外，宋人稱賞品論者尚多，這是本文論題成立的重要依據。茲擇其較著者列舉如下：

- （一）黃庭堅〈跋王荊公禪簡〉：「暮年小語，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也。」（《豫章先生文集》卷三十）
- （二）趙令時《侯鯖錄》卷七：「東坡云：『荊公暮年詩始有合處，五字最勝，二韻小詩次之，七言終有晚唐氣味。』」
- （三）葉夢得《石林詩話》：「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轉，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渠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歷代詩話》，頁406）
- （四）許顗《彥周詩話》：「東坡海南詩，荊公鍾山詩，超邁絕倫，能追逐李杜陶謝。」（《歷代詩話》，頁383）
- （五）闕名《漫叟詩話》：「荊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宋詩話輯佚》，頁362）

關於這些言論所涉及的細部問題，將在以下正文中逐一討論，此處先略述與論題的成立密切相關者。荊公詩歌創作的精粹時期，一般都泛舉「晚年」、「暮年」。彥周則標出「鍾山詩」，漫叟則標出「定林後詩」，界定更加明確。荊公於熙寧十年返金陵，隔年乃在鍾山白下門下築宅而居。平日最常出入定林禪寺，寺中有昭文齋，最初幾年荊公即在此撰作《字說》。然而荊公退閒期間，出入於名寺古剎，來往於山水城市，足跡遍及金陵附近各地。若以「定林後詩」或「鍾山詩」標題，時間與空間的涵蓋面都有侷促之虞。因此，本文採用「金陵詩」的概

〔註6〕陸游〈跋半山集〉云：「右半山集二卷，皆荊公晚歸金陵後所作詩也，丹陽陳輔之嘗編纂刻本於金陵學舍，今亡矣。」見《放翁題跋》卷二。另據《宋史·藝文志·總集類》記載，荊公有《建康酬唱詩》一卷，今佚。

念，〔註7〕指稱再罷相定居金陵以後的所有作品，具體界定「荊公暮年詩歌」的範圍。

荊公詩文，向乏繫年，當代學者始用意及之。王晉光有《王安石詩繫年初稿》，李德身則有《王安石詩文繫年》，綜合二書，可以繫入退閒十年間之作品，約有四百多首，佔總數的四分之一。此外，劉乃昌、高洪奎有《王安石詩文編年選釋》，周錫馥有《王安石詩選》，都曾考訂部份作品的年代，亦可為本文論述之佐助。

第二節 荊公詩文集及其箋注

荊公詩文集的刊行，有臨川本、杭州本、龍舒本等三種。臨川本以詹大和紹興十年（1140）所刻《臨川先生文集》為最早，此本分詩集三十八卷，文集六十二卷。原刻似已不存，常見者有嘉靖二十五年（1546）應雲鸞翻刻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即據此影印。杭州本為紹興二十一年（1151）荊公曾孫王珪所刻，題為《臨川王先生文集》，清人瞿鏞以此本核對明翻詹大和刻本，發覺卷第皆同，所錄作品出入亦微，當為同一系統。原刻亦不傳世，惟北京圖書館藏有宋刻元明遞修本一部。上述二本流傳雖廣，翻刻亦多。然篇目或羈亂不實，或缺佚不全，都不無缺憾。惟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有宋刊本殘卷，書刻於龍舒，題《王文公文集》，存七十卷，三十六卷以前為詩，三十七卷以後為文，系統與前述二本顯然有別。實則中土亦有此本殘卷，原藏大內，故為世人所罕知。1962年，大陸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統整兩處殘卷，乃得全豹，於是影印行世，是為龍舒本。臨川、龍舒二本篇目內文都頗有出入，取相對勘，可收互補之效。〔註8〕

〔註7〕宋人每有以「金陵」稱呼荊公者。例如與荊公並世的劉安世，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即是如此。另可參閱東一夫《王安石事典》，頁145。

〔註8〕關於荊公詩文集的版本問題，可參閱金開誠、葛兆光《歷代詩文要籍詳解》，頁531～535；于大成〈王安石著述考〉，《理選樓論文集》，

近來年則有鉛印點校本，更便於翻檢。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臨川本系統的嘉靖刻本為底本，校點排印。書後附有《臨川集補遺》，匯集島田翰、陸心源、羅振玉所輯詩文，及朱孝臧、唐圭璋所輯佚詞而成，在台灣有華正書局翻印本。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龍舒本為底本，參校臨川系統的應氏刻本，標點印行。惟此二本皆未盡理想。前者出版時，龍舒影本尚未整理印行，《補遺》部份一方面漏收許多佚文佚詩，另則誤收了許多臨川本已有，只是題目稍異的作品。後者則未作補輯，更無任何點校凡例或附錄，明顯失之率易。〔註9〕晚近北京大學所編的《全宋詩》四川大學所編的《全宋文》，陸續出版，除重新參校上述各本外，又廣收佚篇，為目前為止最完備的版本。本論文援引荊公詩文即以此為準。至於荊公集中頗多疑偽之作，也廣參當代學者的研究以為去取依據。〔註10〕

荊公詩有李壁雁湖注本，論者比諸「施注蘇詩」，向為研究荊公詩所必參考的重要文獻。壁父燾，乃南宋史學大家，所著《續資治通鑑長編》，亦為研究荊公所必備的參考資料。壁既家學淵源，性又嗜讀若渴，當時號稱「博洽」。箋注荊公詩，用力頗劬，久為士林所稱賞。此書通行者，有元大德十年毋逢辰刊本，〔註11〕板精字清，可惜

頁 226~227；方元珍《王荊公散文研究》，頁 72~79；四川古籍整理研究所編《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島田翰〈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程弘〈王安石文集的版本〉，趙萬里〈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吳惠珍〈王安石詩文集版本考〉。

〔註9〕參閱金開誠、葛兆光前揭書，頁 535。

〔註10〕荊公集中疑偽之作，參考李燕新《王荊公詩探究》，頁 48~58；張白山《宋詩散論》，頁 67；李德身《王安石詩文繫年》，頁 315~327；王晉光《王安石詩繫年初稿》，附錄。

〔註11〕此本係張元濟舊藏，現藏國立中央圖書館，嘗經廣文書局借出影印行世。昌彼得前揭文指出：「中館舊版《善本書錄》及《金元本圖錄》定為王常刻本固誤，新版善目從阿部隆一教授之說，改訂為元末明初刻本，亦非。阿部氏之說係據《中國版刻圖錄》敘目，觀其本版式字體，為元代建刻無疑，與毋氏序合，當即毋氏刻本。」案學者從《中國版刻圖錄》說者，除阿部氏外，另有王水照前揭文、大陸版《全宋詩》編輯說明（第十冊，卷五三八）。臺靜農有〈記王

已經劉辰翁刪節，宋本舊貌，十存一二，學者不無遺憾。〔註12〕近年來，雁湖注本在文獻上有兩項重大進展，提供重探荊公詩的新契機：其一是朝鮮古活字本的刊行，其二是宋刻殘本的面世。前者有王水照所撰〈前言〉一篇，記其始末甚詳；後者則昌彼得撰有〈連城寶笈蝕無嫌——談宋版李壁注王荊公詩〉，詳加介紹。二文皆以新材料為基礎，對李注版本系統作深入的整理與分析，各有創發，釐定了不少久懸的問題。

活字本今藏日本蓬左文庫，注文比元刻本多出一倍。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據王水照分析，此版為宋元兩本的合編重刻，既保留宋本的原貌，又加入元本的內容。書凡五十卷，目錄上中下三卷，有劉辰翁評點，劉將孫、毋逢辰兩序，又有詹大和《王荊文公年譜》，此為元刻本所有（僅無王常刊記）；又有李注全文、「增注」、「庚寅補注」、魏了翁序（僅無胡衍跋），此為宋刻本所有。故知此本是宋元兩本的合刻。

「增注」與「庚寅增注」，是宋版與朝鮮本所獨有而為元刻本所缺者，其價值不言可喻。「補注」作者，前人以為即李醇儒或曾極，但據昌彼得、王水照研究，應當仍出自雁湖。蓋在嘉定七年初稿版印之後，雁湖可能仍續有增補。〔註13〕「庚寅增注」的作者則疑義稍多，蓋「庚寅」為理宗紹定三年（1230），時雁湖沒世已八年，王水照以此斷定「庚寅增注」絕非雁湖所為，昌彼得則推測仍為雁湖遺稿。卷四十八「庚寅增注」曾提及「亡友譚季壬」，陸游嘗稱「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慶元元年（1195）有詩懷譚氏，稱之為「亡友」。王水照據此推斷譚氏卒於該年以前，並謂「慶元元年離紹定庚寅已三十多

荊公詩集李壁箋注的版本》一文，將此本斷為大德五年刊本，似是採中國舊版《善本書目》之說。

〔註12〕劉辰翁刪節李注的情形，以臺靜農前揭文討論最詳。今宋本殘帙及朝鮮本既面世，事更昭然。

〔註13〕參閱昌彼得前揭文，頁98；王水照前揭文，頁9。二氏論證角度雖不同，結論則無異，可以互參。

年，庚寅增注的作者回憶三十多年前的老友，說明他年事頗高了。」由於王教授認定「增注」作於庚寅，故作此推斷。其實此條正足以佐證「增注」不作於庚寅。季壬與陸游既以兄弟交，年紀似不致相差太大。陸游作此詩時已七十一歲，而庚寅去此又卅五年。若增注確作於「庚寅」，則注者年事極可能超過九十。比較合理的推斷是：「庚寅增注」，意謂「庚寅年增刊之注文」，而非「庚寅年增作」。因此，注文應作於是年以前。論者謂卷後「補注」有與「庚寅增注」犯複者，其實「庚寅增注」與原注犯複者，亦所在多有，可能是整理者一時失察，以致重複補綴。

明清以來，得睹注本全貌者甚少。晚近研究荊公詩歌者，也多未及運用新的文獻。宋本殘卷尚未製成微捲，目前難以充份考察。好在朝鮮古活字本兼有宋、元兩本的面貌，並且全帙完好，又經影印刊行，參考價值極大。本文徵引荊公詩，即在詩末標注活字本卷數、頁碼，以利翻檢。但此本缺點在於異體別字特多，因此徵引作品時仍須廣參別本，才能免於以訛傳訛。故此本以外，廣文書局影印大德本，仍然不可或缺。兩本相校，除文字互有出入外，大德本所收李注、劉評，古活字版多有失收者。如卷十七末尾，劉評曰：「其詩猶有唐人餘意者，以其淺淺即止，讀之如晉人語，不在多而深情自見。」即不見於古活字本。此外，大德本有加框小字，分陽文與陰文兩種，如卷三十三〈奉酬永叔見贈〉，李注引及王儔及韓駒意見，而加框文字乃一一駁之，則框文並非「補注」或「增注」系統。框文幾乎專評李注，也與劉辰翁評語之專論荊公詩，判然有別，似乎也不出自辰翁之手。這一部份，古活字版或失收，或刻入原注下，有時甚至淆亂原注語意，使用時都須取大德本相互比對。

清人沈欽韓撰有《王荊公詩集李璧注勘誤補正》四卷，劉承幹跋其書云：「全注依據正史，旁採眾家雜說，隨篇辨證，意在整齊舊聞，網羅散佚，凡朝章國故之沿革，君子小人之進退，與夫師友淵源之流別，靡不詳考。」可見沈注之富於學術性，早為前人肯定。不過，由

於沈氏未見宋本，所補頗多爲李注原有，今可見於古活字本者。沈氏以外，糾補李注者尚有清人姚範《援鶉堂筆記》、近人錢鍾書《談藝錄》，前者得百餘條，後者亦有四五十條，都十分精當，有助於本題研究的進行。此外，近儒嚴復亦曾評點臨川詩，片言隻語，粲然可觀，價值不下於劉評。以上即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文獻流布概況。

第三節 論題旨趣與研究方法

據統計，目前學界對宋代詩家的研究，直接以荊公爲對象者，僅次於東坡、放翁，而過於山谷。^{〔註14〕}不過，學術研究的成果有時難以量計，我們不能據此斷定學者對上述諸家的瞭解最爲深入。蘇陸王黃規模宏大，質量俱勝，待探討分析的問題自然最多。何況後世對某一詩人最精闢的見解，往往不見於直接以該詩人爲題的論著中。因此，評估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值不值得再研究，應以問題是否已經清楚解決爲權衡標準。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詩又是最精粹的心靈產物，包含極其豐富的意蘊。真正的大詩人，永遠值得再探討；真正的好詩，永遠有再開發的空間。基於以上的理解，本文的開展乃是以下面四個環結爲中心：

一、以「文史互證，顯微交融」的方法，追索荊公的性情與暮年心境。

詩之大用，曰興、觀、怨、群。深於詩者，不僅用以反映人生，更在創作中提昇自我，澄定生命；不僅運用語言，更能反省語言的本質與性能。詩人體物言志，著力追索突破，最終價值仍在於實現自我。詩的精義所在，也就是生命本體之所在。傳統的文藝批評活動，經常在從事「文藝審美」的同時，也進行了「人格審美」。詩既不能獨立

〔註14〕見張高評〈從《宋詩研究論著類目》《宋詩論文選輯》看宋詩研究的方法和趨向〉。關於荊公的研究論著，除張高評編《宋詩研究論著類目》外，另可參閱王晉光《王安石書目與瑣探》。

於人生之外，凡是不能客觀體會荊公的人格與性情，也不可能真正瞭解其詩。此不僅指詆毀者而言，若是執於個人的學術立場而一味推尊，以致迴護曲解，同樣無法契入詩歌的底蘊。近世以來，學者偏重於為荊公的人格辨誣，至於荊公性情與暮年心境，似仍有待重新追索探究。

荊公一生心力所鍾，實在政治與學術之間，雖對詩文創作深具自信，終不肯以此自名、以此自限。直至退居鍾山，仍孳孳於撰作《字說》，幾乎視為淑世理想的最後寄託。因此，要想讀出暮年詩歌的底蘊，必須對他的人生格局有全面的體會。荊公退居金陵乃緊接於變法運動之後，因此，這段從政經驗對他衝激最大，餘波盪漾，直至去世而未曾稍息。雖然暮年篇詠，不常直接以政治為素材，但政治經驗與時局感受卻深入創作心靈的底層，成為暮年作品的潛在基調。筆墨大部份集中於遊覽賞景，情調刻意保持清明，從不直接把身世之感透露出來。如果一概以「閒適詩」視之，自不免得出「有工緻而無悲壯」的結論。本論文第二章，即著重探索他暮年心境與詩藝的交涉。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晚近余英時著有《陳寅恪晚年詩文箋證》一書，揭示「文史互證，顯微交融」的方法，最具啟發性。

二、通過荊公整體學術，清理出詩學架構，以抉發其「晚年所走路數」。

徐復觀曾作〈宋詩特徵試論〉，列有「宋詩特徵的畫出者」一節，特別標舉荊公在宋詩發展史中的地位：「積極奠定宋詩基礎的，應推王安石。王安石學博才高，思深律嚴，晚年所走路數，與山谷相同，而學問才氣及胸次遠過於山谷。宋詩之特徵，至他而始完備。後人對宋詩所作或好或壞的批評，皆可在他的詩中看出。因宋人多反對他的新政，所以他在詩方面的影響，遠不及黃山谷。」從宏觀的角度表彰荊公的地位，立論十分獨到。歷來論荊公在詩史中的地位，當以此說最精采。徐氏原文曾多方援舉實例來說明荊公的具體貢獻及對山谷的

影響，不過文章仍以山谷爲中心來抉發「宋詩特色」，他對此有所說明：「惜『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於詩，而不肯以詩名』（《寓簡》卷八），所以他論文論詩的文字絕少，詩的聲氣遠不及山谷，本文遂不得不以山谷爲中心。但由上所述，斷不能忽視他在宋詩中的重要地位。」這裡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荊公在宋詩發展史中意義重大，只是他談藝文字特少，以致後人難以進行相應的論述。

荊公論詩文字不多見，固然形成後人尋索上的困難。但是通過對他整體學術格局的把握，仍可清理出詩學架構，這在宋代的文化環境裡格外可行。荊公暮年詩歌的思想底蘊，仍不出新法、新經、新學，此固貫串其一生，決定風格趨向的關鍵所在。此外，荊公詩藝突破的基礎，在於「博觀約取」的歷程，觀察他取法的對象，不僅可以瞭解其詩學觀，更有助於把握晚年詩風的內在根源。本文第三章即由上述方向入手，試著重新鉤勒荊公的詩學型態，以期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理解他「晚年所走路數」，從而抉發「他在宋詩中的重要地位」。

三、以意蘊與美感爲中心，把握「金陵詩」的內在特質，呈現其境界。

荊公爲「新學」的開創者，具有十分強烈的理性精神與義理興趣。因此，早期作品已具有顯著的議論傾向，其內容則以論政詠史爲主。暮年退居金陵後，既脫離直接的政治活動，佛學素養與藝術體會都日漸加深，於是轉而以比較迂迴的方式追求義理。但是，表層內容雖以宗教體悟與人生哲理爲主，底層卻蘊含充沛的政治經驗與時代感受。

葉石林說荊公「少以意氣自許」，蔣山贊元禪師也曾說他「受氣剛大」，都是在描述一種猛烈勃動的生命氣質。不過，贊元同時也指出荊公另有「視名利如脫髮，甘淡泊如頭陀」的性情。退閒金陵，雖然主要表現出「淡泊」的一面，但這並不表示他已滌盡早年的「意氣」，只是隱入底層而已。由於秉性淡泊，加上虔誠的佛教信仰，因此絕不

沈溺於感官經驗。但另一方面，潛存的「意氣」卻使他的作品暗潮洶湧，終於形成一種獨特的美感特質。

荊公暮年出入古寺，浸潤內典，或與高僧大德共領禪機，或獨處自修，哲理體驗特別豐富。這類體驗大抵近於宗教境界，但未必僅以宗教為範圍。一旦通過豐富的學識與才情，化作篇詠，經常能臻及美善互涵，道藝合一的境地。黃徹《蛩溪詩話》論及「道」之「有味」，即援舉荊公金陵絕句數首為例，並謂「皆淡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容也」。本文第四章，即嘗試通過此一線索，探討荊公暮年的心靈體悟，以及由此為根本，所開創出來的融合義理與美感的藝術境界。

四、觀察體裁、技巧、風格的演變，探討荊公詩何以「暮年方妙」。

錢謙益〈與方爾止〉書云：「古人詩，暮年必大進。詩不大進，必日落，雖不欲進，不可得也。欲求進，必自能變始；不變，則不能進。」（《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以此種思路處理宋人的詩藝發展，格外可行。蓋宋型文化內斂精深，表現於詩學，則講究一種「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的審美理想。宋人每謂：「荊公之詩，暮年方妙」。這一方面來自「漸」的工夫，一方面則與「能變」有關。欲尋究荊公暮年詩藝精妙的根源，自然須深入觀察他「變」的軌轍。

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中列有「王荊公體」，並自注云：「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滄浪認定荊公具有獨特的個人文體，主要著眼於絕句。此固荊公暮年的獨詣，而為「金陵詩」的主體，但宋人特別講究「備眾體」的概念，並以之衡定詩人成就的高下。事實上，荊公暮年在古體與律詩方面也有新的突破，兼顧及此，才能完整呈現其詩藝。

十八世紀的法國學者彪佳（Buffon）曾提出「文體即是人」的命題。也就是說，文體乃是個人生命的全幅展現。因此，所謂「王